

XINSHANGDENAXIESHIER



心上的事儿

■ 李三卫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素描写真式的自传体,记述了作者家乡、家族、家庭一百多年,特别是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化、个人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以及与疾病抗争的心路历程。于细微处彰显了亲情、爱情、友情的伟大力量,表达了作者真诚、善良、朴实、刻苦、勤奋、进取的思想品质和感恩社会、亲友、乡邻、同事的真实情感。阐述了社会发展进步、国家和谐昌盛是个人、家庭幸福基石的深刻哲理,表明一个立志为国家奉献才智的人只有将自己与团队、企业、社会融为一体,才能有所作为,实现个人的理想。作者用心记下的琐事、琐事和不为人们关注的平凡事,呈现出一个石油人及其子孙一幅幅不同生活场景的真实图画,定能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和心灵的共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上的那些事儿/李三卫著.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021-9159-7

I. 心…

II. 李…

III. 李三卫—回忆录

IV. 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2012)第 148190 号

心上的那些事儿

李三卫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 100011)

网 址: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010)64266875 发行部:(010)6452362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长庆油田新闻中心印刷厂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25.25

字数:452 千字

定价:90.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家	(1)
一、家乡的记忆	(1)
二、房屋的变迁	(5)
三、爷爷、奶奶和姑姑	(11)
四、父亲的故事	(15)
五、怀念母亲	(36)
六、叔父的一家	(51)
七、手足情深	(59)
八、孩子们的趣事	(67)
九、温暖的家庭	(91)
第二章 成长的足迹	(101)
一、童年的理想	(101)
二、哪里需要哪里“搬”	(109)
三、“五大员”的故事	(114)
四、感人的情谊	(118)
五、文书的喜悦	(123)
六、给养员的尴尬	(126)
七、驾驶员的风光	(133)
八、官场上的波折	(145)
九、读书梦的实现	(149)
第三章 当秘书的日子	(157)
一、初当秘书的感受	(157)
二、到勘探前线写材料	(161)
三、“爬格子”的苦与乐	(168)
四、突发事件的考验	(177)
五、为有困难的人办事	(181)
六、帮助人不能图回报	(183)
七、热情接待来访者	(187)

八、真诚待人求和谐	(191)
九、领导帮我渡难关	(194)
第四章 遭遇疾病的时候	(197)
一、往日身体	(197)
二、惊梦病魔	(198)
三、手术与化疗	(204)
四、求医问药	(211)
五、惊弓之鸟	(216)
六、同病相怜	(224)
七、食疗与锻炼	(226)
八、友情与话疗	(229)
九、亲近自然	(234)
第五章 爷爷与两个孙子的日记	(243)
一、2008 年 9 月日记	(244)
二、2008 年 10 月日记	(250)
三、2008 年 11 月日记	(266)
四、2008 年 12 月日记	(281)
五、2009 年 1 月日记	(291)
六、外孙趣事	(293)
七、生日乐	(296)
八、爷孙亲情	(297)
第六章 难以忘却的记忆	(305)
一、雨中行	(305)
二、回家过年	(307)
三、收割季节	(315)
四、老屋的记忆	(320)
五、麦苗青青	(323)
六、寄老首长	(325)
七、武周	(327)
八、怀念岳母	(330)
九、又是大雪纷飞时	(333)
十、哭妹妹	(337)
第七章 我与长庆的故事	(341)
一、来长庆前的不眠夜	(341)

二、“团长”的夜晚	(343)
三、走出去的长庆人	(346)
四、“五种精神”的感动	(348)
五、艰难的胜诉	(354)
六、园林的启示	(358)
七、泾渭苑小记	(362)
八、我是报社通讯员	(366)
九、在人民大会堂领奖	(373)
后记	(377)

第一章 我的家

我的家，说的不是我现在的家。现在的家，在古城西安北郊兴隆园小区，屋外似花园一般，室内宽敞明亮，非常之美。但在我的脑海深处，它似乎只是我旅途中的一个“客栈”。

记忆中的家，是那生我养我的地方，是那梦回千百次的老家——陕西省户县甘亭镇青羊寨村。那里，有祖辈们留下的印记，有我童年的欢乐、少年的烦恼，有许许多多扯不断、撕不开的思绪和记忆。

一、家乡的记忆

秦岭脚下，渭河之滨，户县县城东北角二里之外，有一座被城墙围着小寨子。这里绿树环绕，炊烟袅袅；耕牛漫步田野，鸡鸣犬吠屋前。乡间小道，田间地头，有荷锄挑担者，历风雨，冒骄阳，忙忙碌碌；有白须拄杖者，纳凉于树阴之下，含饴弄孙；有穿红戴绿者，扶老携幼于街头巷尾。这就是我的家乡——青羊寨村。

记忆中的家乡，既宁静、祥和，又荒凉、贫穷。

四周的城墙，已是残垣断壁，有城壕围于外，积水一人多深，浮萍漂于其上，蝌蚪游于水中；城墙内四条小巷，成井字形，分东西南北四条小街。村西头，多为瓦房，前后两进，四合小院，排列有致，为贺姓、王姓人家，多为殷实之家；村东头，茅屋居多，瓦房点缀其间，多为李姓、韩姓，贫寒之家居多。全村百十户人家，三四百口人。

村中有三条路与外相通。

出南门，迎面一棵大白杨，合抱之粗。树下一条大道，分两叉。一条直向南，不足千米，通户县火车站；一条斜向西南，弯弯曲曲，穿过排洪渠，约二里之遥，便是户县县城。

出西门，路北有古庙一座，青羊寨完全小学便建在此处。

大庙之内，神像若干，柱粗门高，极为阴森。檐前两侧有小屋，为教师办公兼居室。幼时上学，最怕到这个地方，多少年后做梦，也常因到此地而惊醒。



庙前右侧，有一棵刺柏树，合抱粗，数丈高。老人们讲，刺柏树生长极慢，这棵树少说也有三百年的岁月。刺柏之前是中庙，神像已搬，作为一、二年级教室；中庙两侧，男左女右两个学生厕所；厕所之前东西向两庙相对，东为三、四年级教室，西为学校门卫、村中本族一五保老人所居之处。

侧庙之前，以十字道路为界分建四个小花园；正门中央有过厅，过厅之东数丈之外，为教师厕所。过厅之前，有条路直通大门，两侧为操场。

大门为半圆形，砖结构，两侧有土墙成弓抱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分别书于其上。

小学门前，有两条小路，一条向西至东韩村，一条向北通南郭村。

出东门，有一小径，过铁路，通青羊务村。沿铁路向北再折向东，有一小路到青羊务西堡，路旁有一土地庙，庙堂已毁，仅有善男信女垒一土台，很小，逢年过节时有香火。倒是土地庙院内有一棵大柏树，三人合抱，树冠很大，而且年代久远！

不知何故，村子无北门。城墙之外，全为城壕，较宽，有一小渠通向东北大渠，是村里的排水道。

家乡虽处关中腹地，素有“银户县”之称，但在我幼小心灵上铭刻的却是“贫穷”二字。有民谣为证：

有女不嫁青羊寨，
稀泥达到腿膝盖，
一天三顿浆水菜，
青蛙爬了一锅盖。

老天爷造物，极为奇特。村子以西、以北二里，全是黄土地，唯独村东全是黑胶泥土。这黑胶泥土天晴硬如石，下雨全稀松。

传说有一外地老者，夜晚赶车去县城，天快明路过村子时，车轮脱落。那时的车轮，有碾盘那么大，轮毂、轮辐均为木制。老者安好车轮，销子没法砸进去，便随手在地上捡了一块似石头的硬块狠砸了几下，销子被砸进去了。修好车，天已亮了。老者准备起程时，忽然想起若车再坏时，还需要这块“石头”。于是他走到刚才修车的地方，准备捡起那块“石头”，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傻了眼，原来用来砸销子的是一块土坷垃，遍地都是。

土质虽硬，但一遇雨水，却又稀又黏，脚踏到地里，一尺多深，拔都拔不出来。

这样的土地，遇到天旱，地上裂出一条条大口子；稍有阴雨，又遍地

是水，每年七八月连续阴雨天气，井水快冒出地面，打水时不用绳，直接拿桶在井里提。

即使无旱无涝，这里也会常刮西北风。狂风呼叫，带着哨音，把碗口粗的大树连根拔起，地上的豌豆蔓被刮得能跑二里地（1公里）。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提着担笼（陕西方言，与竹笼相似）到地里拔猪草，忽然发现天西南角黑云滚滚，同行的老大娘大声喊道：“天要变了，快跑！”我提上担笼，拔腿就往村里跑。

谁知跑到半路，大风突起，将担笼里的草吹得一千二净。这时的担笼如同一把张开的伞，带着我向前跑。我的身体犹如下山的石头，似乎脚不着地，像飞一样。

这时，路旁晾晒麦子的人们也都忙作一团，刚刚将麦子收到一起，却又下起了暴雨，麦子被冲得一千二净。

那时，地薄苗稀，一亩地最多能收一百五十公斤。被大水一冲，连口粮、种子都没有了。

这种环境，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差，因而年年遭灾，只能靠天吃饭。每到二三月青黄不接时，大人娃娃都到地里挖野菜充饥。这样的日子，年轻小伙子娶不上媳妇是常事。一遇涝灾，遍地是水，夜深人静时，青蛙之声此起彼伏。久而久之，“有女不嫁青羊寨”的民谣便传开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家乡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解放初期入党的一批老党员，带领群众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治涝、治旱、治土、治风沙，彻底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在我们村正东面修了一条大渠，直通渭河，将地下水排走，遇到雨天，村里村外，再也见不到积水。

之后，村上又组织壮劳力打机井，每四十亩一口。遇到天旱，水车吱吱叫，清水哗哗流。

仅抗旱这一招，先后变化了几次，一次比一次先进。

解放前和20世纪50年代初，浇地全靠人摇辘轳，一桶水打上来，前一桶水快流干了，稍有旱情，便成灾年。

50年代中期，用的是人推水车。就是将两根木棍插在水车的轴柱上，人推木棍，像老牛拉磨一样，绕井口转圈圈，将井底水抽到地面。这样，比人用桶从井里提水浇地前进了一大步。

60年代初，又安上了电动水车。这种水车是将人推水车做了改动，用电动马达作动力，皮带作传导。这种水车省力、省时，流量又大。水车一开，水哗哗地流。但却经常发生掉皮带、法兰卡在井底等故障，需要看



水人来回跑，挺费事。

到70年代，地下水位下降了，原来井水只有三五米深，这时没有二三十米见不到水，浇地又换成了潜水泵。潜水泵不仅出水量大，而且很少出故障，既省人、省力，又省事。这时候，还需要修水渠，有时水渠跑水，满地都是，有的地方浇上了，有的地方浇不上。

80年代后，出现了塑料水管，接在潜水泵出水口上，想拉到哪里就到哪里，真正实现了“自动化”浇地。原来需要两三个人才能完成的事，现在一个人就行了。

这样，旱涝保收的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了。

在治理“三害”中，治土的工程量最大。有科学家给村上出主意，给黑胶泥土中掺沙子，可改变土质。

村民在队干部的带领下，每年冬天，男女老少到涝河去拉沙子。天没明就出发，到吃早饭时都拉回来了。



20世纪70年代，青羊寨盖起了新房舍，为四邻村庄所羡慕。摄于1991年

同时，每年给地倒茬，闲散的土地，人力翻地三尺，将沙子一层一层地铺上，又一层一层地盖上黑土，达到松土的目的。为这事，队长李志明被誉为“牛队长”，他死后，还上了《户县志》。

经过近十年的奋斗，土质全变了。由过去的胶泥土，变成了油沙土。

产量也由原来的一百五十公斤，到二百至三百多公斤。到了 90 年代以后，采用科学种田，推广良种，每亩地秋夏两料可以达到一千公斤。

村里在治土的同时，还在道路两旁植树，建成了百亩方田，形成了一道道绿色的屏障，减少了风沙的侵害，家乡真正成了绿色遍地、粮食满仓的富裕之地。周围的人们看法也变了，说青羊寨的地能打粮食，是因为那地都是黑土地，黑土地，黑油油，肥着哪。远近十里八村的人们，争着在青羊寨为闺女寻婆家。

青羊寨的老人们都知道，是奋斗改变了土地，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昔日的荒草滩成了米粮川。

在村里，李姓是大户，也是老户。据老人们讲，清朝时，李姓户就很大，祖先曾有人官至一、二品，封为红顶子，村西祖坟很气派。在 19 世纪中叶，发生民族矛盾，因青羊寨李家有人在清朝做官，镇压起义，夜晚围剿回族队伍所打灯笼上“青羊寨”三个字很耀眼，结下怨仇，回民到村后，杀了李家二十一口，埋在了村外的枯井内。那口枯井被填堆成小坟堆，小的时候常见到，现在仍然依稀记得。

死里逃生的李姓人家，一支跑到秦岭山脚下太平峪口，繁衍生息；一支到了割耳庄；一支到了南郭村；还有一支在本村生存下来，就是我的前辈。到我曾祖那一辈，弟兄四个；爷爷这一辈，弟兄六个；父亲这一辈，李氏兄弟有十人；而到我们这一辈，已有十五人；到我的下一辈，算起来有二十五人，也算人丁兴旺。

二、房屋的变迁

在关中地区，自古以来有一种说法，人生要办两件大事：一是盖房，二是给娃娶媳妇。不少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将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了这上面。还有些人，奋斗了一辈子，也未能办成这两件事，遗恨终生。

“娶媳妇盖房，花钱没王”，这是流传在家乡父老乡亲中的口头禅。关中的汉子，有无能耐，就看你能不能盖上三间大瓦房，许多人把三间大瓦房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

可是在解放前，穷人家吃穿都愁，盖房只能是一种奢望。我的爷爷奶奶，奋斗了大半生，才在自己的祖居地买了一块桩基，盖了两间茅草屋。

两间茅草屋，坐落在东门里城墙边上。门前数丈是街道，院后数丈是一片林子，为旁人的宅基地！



父亲常为此叹息，当初买宅基地时，说好的是直通城墙根，到划桩基时，却成了这样半截宅地。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仍然住在这间茅草房内。父亲常讲，解放前，一家六七口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养了一头牛在后门口，牛槽还盘在屋内。

在我的记忆里，茅草房很低，光线非常暗。一到冬天，大雪过后，屋檐下常挂上一道道冰凌。上边粗，下边细，十分好看。有时，大人们高兴了，伸手摘下一个来，塞在我的嘴里，凉凉的，甜甜的。虽说比不上现在孩子们吃的冰淇淋，但这是大自然的造化，可谓真正的“宇宙牌”冰棍，别有一番风味。

太阳出来了，从冰凌上一滴一滴地滴下水来。慢慢地，冰凌细了、短了，渐渐地完全消失。房上积雪也一点点地融化，露出一缕缕的茅草。

看到这些，我幼小的心灵不免有些惆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茅草棚前，父亲盖了一间东西向的厦房（与“偏房”同类，但未在四合院内），父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便睡在这里。

房屋非常简陋。因为面朝西，夏天非常热。一到雨天，外边大下，屋内小下，母亲常常端着脸盆接雨。

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舅舅家的房屋年久失修，无人照看，父亲看拆下来的椽、瓦还能用，就用这些材料把我家的草棚翻修了，盖成了两搭瓦房。叔父结婚后，与奶奶住在两间房内。

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父母子女多，拖累大，常为生计熬煎。家中因此不和，常常吵架。于是，父亲和叔父便分了家。

分家后叔父拆了厦房，在村外另盖了两间房屋。虽说分家是不得已的事，但房屋却多了。

60年代末，大概是1968年底，我的哥哥结婚。

两间瓦房只能盘两个炕，哥哥占去一炕，另一炕连着锅灶，本身就不大，还要挤下我、妹妹、弟弟和父母五个人。妹妹眼看长成大人了，一家人挤在一起，实在不方便，父亲只好让我在外“打游击”。

我先是睡在门宗大妈家，后来睡在生产队饲养室。叔父看到我在外睡觉，于心不忍，就跟父亲商量，让我睡在他那里。就这样，我这里睡几天，那里睡几天。父亲一心想把原先的两间房盖成三间，以解燃眉之急。但是，要盖三间房，谈何容易。一是经济上达不到，二是宅基地很难批。那时土地政策非常严格，二十几年全村没有批过一间宅基地。

有人给父亲出主意，让把我家东边的城壕垫起来半间，和城墙的底子

一起，便可增加一间房的宅基。于是，我们一家满怀希望，开始了自造宅基地的奋战。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上学，在家劳动。上地时拉着架子车，收工后装上一车土拉回来，垫在城壕内。城壕足有两丈深，要垫得跟宅子一样平，十分不易。但只要想到我们可以住上三间大房，一家人便信心十足。无论父亲、哥哥，还是我和妹妹，只要一上地，便带回一车土。有时我表哥来走亲戚，也要带我们拉上几车土。就这样，宅基一天天垫起来了。

父亲又开始筹备盖房子的材料，主要是木头，特别是做梁、檩子的大木头。户县虽然紧靠秦岭，但当时封山育林，木材根本买不上。后来，父亲听人说渭南有木材市场，可以买上木料。便约同村一位陈姓人家结伴去渭南。还算好，在渭南买了两根大木头回来。后来又去周至买了些椽子，说是椽，其实和木头棒棒差不多。

当材料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便当兵去了，那是1969年底。一年后，也就是1971年春天，父亲终于将两间房翻盖为三间大瓦房。但比起别人家的三间房要小一些，原因是没钱买足够的木头，只好盖上前后两椽的房子。把前沿墙往外移了三尺，在墙与檐之间搭上五尺长的木棒椽，使房子勉强能盘三个炕、一个灶。

不管怎么样，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三间瓦房。父亲特意让哥哥写信告诉远在云南当兵的我，说是专门留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给我盘了一个炕，探亲回家便有房子住了。我当时非常高兴。后来，村里学大寨，规划桩基，大概在1975年，叔父也拆了他家的两间房，盖了三间大瓦房。

1978年4月，我转业来到长庆油田，当了一名汽车驾驶员。当时，庆阳地区交通不便，一切物资全靠汽车运输。那个年代，汽车司机是个热门行当，社会上流传着不少称誉司机的顺口溜，什么“离地三尺，高人一等”，“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都不干”等。

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这批司机，由于受传统教育极深，并接受了部队多年的严格训练，因而较守规矩，从不干违法、违规的事。但因为腿长，跑的地方多，按现在的话说，获得的信息比较多，便可买到一些便宜的东西。比如说，关中菜多，就顺路给好友带一些。春节前后，庆阳周边地区的肉便宜，也捎一些回家。

一次，我在长庆桥拉货，附近生产队更新路两旁的树木，每棵只卖两元钱。回到家，与父亲闲聊时说到此事。父亲说，这些树可以做椽子，让我给家里买一些。



哥哥当时在大队当出纳，又值村上规划桩基，听说能买到便宜的树做椽子，立即向村上申请桩基地，很快在我们老桩基地的后边批了三间桩基地。

当时家里经济还是比较困难。转业时发的三百多元安家费，父亲除给我买了一块上海手表外，其他的都还了为我办婚事时欠下的债。



1979年盖的新房。摄于1991年

好在当时生产队为每家盖房的出劳力，亲朋好友又帮着打了十几棵胡基，加上我在长庆桥买了90根椽子和几根檩条，哥哥又在村上买了一棵杨树，再砍掉自家门前的三棵大树，凑齐盖房的大木料。共花了七百多元，于1979年春天，又盖起三间大瓦房。

这三间房，是真正的三椽大瓦房，父亲非常高兴。虽说欠了别人几百元的债，但有了两个三间房，心情便宽畅多了。加上我在外工作，一月能挣七八十元钱，一家人省吃俭用，不到两年的工夫，账也还得差不多了。

后来，我不开车了，在运输处四大队当调度员，与司机们的关系比较好，也能托人办些事，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几次偶然的机会，我又给家棚楼买了楞子，又买了几根檩条。此时，哥哥的孩子也逐渐长大。为了以后的日子，哥哥便给父亲做工作，想再盖三间房。

1981年春，三间房的桩基地很快批下来了。哥哥组织人赶忙打胡基。但这时盖房的木料一点也没有，用父亲的话说，这叫“光屁股撵狼，装胆

大”。无奈之时，父亲只好来庆阳市，让我再买些盖房的木料。

父命难违，我只好四处托人。还算运气好，经几个朋友帮忙，在子午岭林场搞到了一点木材指标；在长庆桥坡头上的一个生产队买了些道旁树；一位老乡在内蒙古买了一车松木，又让给我两根。盖房的木材总算凑齐了。

1981年底，我家在村子南头又盖起了三间大瓦房。这在村上少见，大家都非常羡慕。

第三年，叔父也要了一院桩基，给他的大儿子盖了一院三间的大瓦房。

在解放后三十二年的时间内，我家的房屋由过去的两间茅草屋变成了十五间大瓦房。

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家的住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3年，哥哥再次申请了三间桩子，盖了三间两层的楼房。

1995年，妹妹家也由原先的两间瓦房盖成了二百二十平方米的别墅式楼房。

1999年，弟弟将我家原先的三间瓦房翻盖成了三间两层楼房，大约有二百五十多平方米。

2003年，叔父家在三间瓦房的后面，也盖了二百多平方米的三间两层楼房。

我在外工作，住房条件基本上也是四年一变化。

1987年，妻子儿女迁到油田时，我们只住了一间筒子楼。大概有十四五平方米。1988年底，父亲生病，瘫痪在床。1989年5月，我将父亲接到庆阳，一家五口就住在这样一间房子里。屋内有一堵墙隔成两小间，里边一间父亲住，外边一间我们四口住，屋外走廊作为伙房。

当时，妻子和孩子们的户口已经转到庆阳，按政策可以分到正式住房，但因我所在的运输处住房很紧张，1988年分房时没有考虑。我找到主管分房的领导，反映了我父亲有病的困难，希望能在腾空的旧房里给我们解决一套有厕所的房子，哪怕小一点也无妨，但因父亲户口不在油田，无法解决，只好在那间小房内将就过日子。父亲住了三四个月，到了三伏天，屋里闷热，实在难受，父亲要求回老家，我只好含着眼泪将父亲送回了家。

到了1989年底分房时，调到一间五十二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旧房子。拿到钥匙，已快到1990年春节了。我和妻子在办公室同事的帮助下，连夜苦干了三四天，将房子重新粉刷了一遍。毕竟在油田第一次分到正式住房，



虽然心里不是十分满意，但仍很高兴。

不满意的是自己希望分一套楼层低一点、厕所大一点、能方便父亲起居的房子。但这套住房不仅在顶层，而且厕所非常小，还有一个二十多厘米高的台阶，行动不便的老人根本无法使用。

1990年我调到长庆局机关工作。1994年冬，局机关分房时，按各种条件排序，我排在第七名。在二百多套住房里，按先后顺序挑，我挑了一套五十八平方米二室一厅的新房。这套房在中间单元，三层，位置非常好。

当拿到钥匙时，别提有多高兴了。晚上，走进新房，将所有的灯打开，灯光照在新铺的地板革上，明光闪亮。四周墙壁洁白如纸，如同我的心境，要说多平整，就有多平整。

这间住房有百分之六十的产权，交了六千多元。我们在这里高高兴兴住了四年。

1998年7月，局机关搬迁到西安。因工作关系，加上工龄、职务等条件，我排在同类住房第二名。因排名靠前，按着自己的心愿挑了一套八十平方米、中间单元、三层的房子。挑房后，妻子问我，“怎么样？”我说“挑的是白菜心。”可见当时的心情。这套住房三室一厅，儿子、姑娘都有自己的卧室，客厅也比原来的大了许多。这套住房是百分之百产权，交了四万两千元。

2003年1月12日，因提职单位又给我在长庆兴隆园小区调整了一间新盖的一百二十九平方米的楼房。四室二厅二卫，位置在四层。这次分的房子，每平方米一千二百六十八元，共计十八万四千元，原八十平方米住房抵价十万四千元。这样，将原来住房交易给别人后，还交了八万元。钱是多了点，但这几年单位效益好，经济上还能承受得起。

2003年8月份，已成家的女儿在未央湖住宅区内，给自己买了一套一百二十一平方米的新房，花了十六万元。虽然他们两口子工作刚刚五年，但因为俩人都在油田一线工作，收入较高，而且都是过日子的孩子，花钱非常紧细。几年下来，也攒了十几万元，买房足够了，未向双方老人伸手。

家庭住房的变化，反映了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要与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家庭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我们伟大的祖国，这几十年日新月异，正在一步步强大起来。生活在这棵大树下的人们，必将日益幸福美满，一代更比一代强。

三、爷爷、奶奶和姑姑

父亲兄妹五个，两男三女。他们小的时候，在村子没有立锥之地。

我的爷爷奶奶，年轻时跟着曾爷爷和曾奶奶，住在户县孝义坊。就是二十四孝中郭举埋儿的故事发生地。小时候，每当父亲说到此事，我便纳闷，为什么祖上会从青羊寨搬到孝义坊。后来从叔父那里得知，原来我的曾奶奶在我曾爷爷去世后，带着爷爷改嫁到孝义坊刘家。刘家的曾爷爷未留下后裔。二位老人去世后，爷爷、奶奶一家便借居在西郭村路边的一间破屋内。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1932年），一家人坐着一辆破牛车才搬回了青羊寨，算是在祖居地有了自己的一块地方，后来又买了“吓滩”的八亩地。

所谓“吓滩”，是村子东北角的荒滩地，偏僻、荒凉，人称“吓滩”。地虽贫瘠，总算有家有业，一家人大大小小其乐融融。

爷爷名光瑞，在家族弟兄中排名老六。爷爷在我还未出生的1950年就去世了，没有享上新社会的福，也未给子女们留下什么家产。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天，若迟走一个小时，便能参加上土改，分上土地。可他偏偏早一个小时咽了气，没有赶上土改的日子。

父亲常说，爷爷是个不太顾家的人。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还定格着两幕情景，这也是父亲多次在我面前提起的。

一个寒风呼啸的日子，在户县县城的街上，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步履艰难地行走着，他不时向街道两边的杂货铺、茶馆、饭店张望着。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小食铺前，他的脚步停住了，双眼凝视着屋内靠门边的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面前，放着热气腾腾的茶壶，还有一包已打开的点心。他一口一口地呷着茶、吃着点心，很是惬意。过了一会儿，这位老人抬起了头，向外斜视，无光的眼神与门外的少年专注的双眼碰在了一起。

少年的眼神，是企盼的眼神，是渴望的眼神。他衣着单薄，饥肠辘辘，多么期待老人能叫他一声，让他依偎在温暖的怀抱，喝上一口热茶，哪怕仅仅是一口，也能暖暖身子；尝上一小口点心，哪怕是一点点，这饥肠也能得到一点慰藉。

那老人始终没有吭一声，只是向外看了看，头又转过去了。伤心的少



年愤愤地向前挪开了步子，两眼泪如雨下。

十多年之后，这一老一少的眼神又对视在了一起：

那是一个凄凉的夜晚，这位老人躺在茅草屋内的炕上，双眼如同炕头的油灯黯淡无光，一只手紧紧握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的手，喘着粗气，喃喃地说：“你一定要在我的身边……”

“大，您放心，我不离开您。”儿子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双眼噙着泪花，不时地腾出一只手，搀扶着老人的胳膊，并将嘴贴在他的耳朵上，细心地安慰着……

就在这个晚上，老人离开了人世。

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爷爷；那位少年就是我的父亲。

爷爷兄妹二人，只有一个姐姐，嫁给户县南关赵家。姑奶奶出嫁后，日子艰难，和娘家少有来往。

每提及这些事，父亲总是热泪盈眶。他说，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爷爷靠着在县城给人当经纪，能挣一点小钱，只顾自己花了。不怪爷爷不养家，只怪世道太黑暗。

叔父曾给我讲，刘家曾爷爷去世后，家里无钱安葬。无奈，父亲只得舅家告借。舅舅非常生气，质问父亲：“你大不管你还倒罢了，为啥他的先人去世了，他也不闻不问，撒手不管了。”生气归生气，还是靠这位舅舅帮助，父亲才把自己的爷爷安葬了。

刘家曾爷爷无儿无女，在我小时候，每到清明节，父亲上坟时总要带我们先去孝义坊上坟，回来后才去我家的祖坟。

爷爷不顾家，家中生活的重担就落在奶奶、几个姑姑和父亲的肩上。

奶奶是个很干练、很有志气的人。

奶奶的娘家在南山根下的下庄，后置房于县城顺城巷。她父母早逝，家中兄妹二人。奶奶的哥哥在县衙当差。膝下无子，曾抱养草滩村一子，名张德民。他从小外出学戏、扮秦腔丑角，演技一般。先在汉中，后到陇南。他喜欢喝酒，也常耍赌。在汉中剧团，他曾与一女子成婚，因嫌妻子常管束自己，愤然离婚。为此事，父亲曾前往汉中劝导无果。后离团到陇南唱戏，且小有名气。一戏迷老汉为其技艺所倾，特将自己闺女许配与他。他们生有两女一男，日子甚是惬意。

父亲的舅舅对父亲疼爱有加，父亲也非常喜欢自己的舅舅。当家里揭不开锅时，父亲常常去舅舅家告借，舅舅每每周济。偶尔街上碰到，还常常叫到饭馆，管上一顿好吃的。这使父亲对舅舅的敬重、依恋超过了自己